

我国情报产业分析

胡 昌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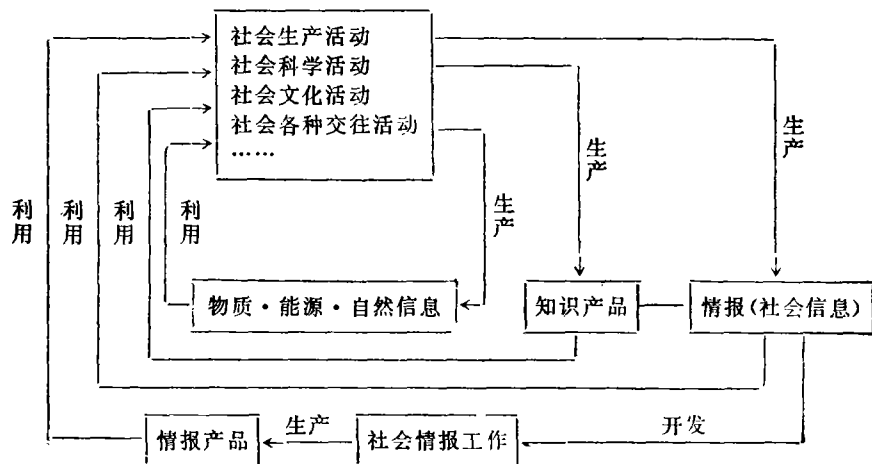
情报产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信息产业的崛起,作为信息产业一部分的情报产业,其地位日趋突出。目前,社会情报工作的产业化程度及其产值已被视为衡量社会发达程度和情报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十年来,中国情报产业的兴起不仅是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它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情报工作,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情报产业作为新兴的社会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内在机理不同于任何其他产业部门。因此,探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情报产业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社会情报产业刚刚起步,处于自然发展阶段,从实践入手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充分,各种认识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从产业基础分析入手,寻求合理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战略。

一、情报商品化与社会情报产业

在物质生产领域,进入交换的物质产品便是我们所说的商品。讨论物质产业及其各种社会互助关系的最佳途径是从“商品”入手分析其内在规律。这一方式对于研究具有知识性的情报来说,同样适用。但是,情报与物质的内涵差异决定了二者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其特征研究便成了认识产业规律的关键所在。

考察人类社会运行机理,不难发现图中所示的“循环”模式。



社会运行与情报工作机理

这里,我们将人类社会活动按功能及内涵分为生产活动、科学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等,由此而形成相互协调的社会分工。在人类社会中,人们通过各种活动消耗能源,利用物质资源和自然信息(物质运动信息、生命信息等)资源,创造经过深加工的物质性产品、再生能源和独立于创造者的物质性自然信息。这些产品通过社会流通,成为人类组织新的社会活动的源泉。我们将这一“循环”称为以“物质、能源、自然信息”开发与利用为基础的循环。在循环中,自然信息反映了自然现象、生命运动和客观物质世界,因而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纽带。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对自然信息的处理和利用过程。

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伴随各种主体(人)的活动,必然产生反映人们活动过程和结果的信息。这是一个不以主体(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可以概括为信息的自发产生过程。这种由人类活动引发的信息,具有自然信息所不具备的社会性,就实质而论可称为社会信息。由于习惯上的原因,在我国往往将其称为情报。情报是一种独特的信息,无论是产生还是传递都不可能独立于人的活动。N·维纳(N·Winer)将其称为“社会的粘合剂”。^①我们认为,情报还可以作为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来考虑。通过情报的产生、传递和利用,人们有效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将导致新情报的产生。这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又一“循环”过程。

人类社会中的知识生产可视为以认知为中介的目标活动,知识产品则是这一活动的结果。与物质性生产过程和结果一样,反映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的信息也将通过主体(人)活动汇入社会信息(情报)流。值得指出的是,情报的认知特性决定了它与知识的天然联系。知识通过情报而传播,情报活动借助于“知识工程”而组织。

在社会运行中,情报工作属于高层次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作用日益突出。当前的世界正处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之中,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加快了知识生产的步伐,作为沟通人们社会联系、传播知识和加强社会科技、生产与文化互助的情报工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社会运行机理看,情报是一种次级投入,其工作发展水平被视为衡量社会产业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在高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科学和产业的高度专门化和综合化,物质流通的加速,知识应用周期的缩短,使社会日益信息化。面临社会的进步,作为社会事业一部分的中国情报工作模式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适应新的情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进展,情报有偿服务模式于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出现,目前已初具规模。据统计,我国科技情报部门截止1988年开展有偿情报服务的单位已占总数的80%以上。^②情报工作由“无偿”向“有偿、无偿”结合模式转化的过程表明,情报正处于日益商品化之中。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情报商品化是指情报作为社会产品而进入市场交换的机理。鉴于情报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有人根据情报的两方面属性将其纳入商品的范畴:(1)情报是一种产品;(2)情报可以进入流通领域交换。^③我们认为,这两条理由说明了情报具有商品的某些特征,然而情报与普通商品是有严格区别的。

讨论情报商品问题离不开情报产生、传递、加工与利用的社会机理研究。据此我们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况按不同层次进行讨论。首先,伴随人类各种活动产生的反映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情报不能纳入“情报生产”的范畴。这是由于活动目标并不是“生产”情报,也不是为了交换情报而组织这些活动的。根据马克思对商品特征的基本分析,我们有理由将其排除在商品范

畴之外。其次,产生于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中的情报构成一种社会必需的情报资源。如同自然物质资源一样,人们对情报资源也可以发掘,一部分也可以转手买卖(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贩子”转卖各种军事、科技、经济情报等)。通常,人们对情报一次性搜集和提供工作是在低层次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现象。社会中各类情报机构和部门开展的业务工作是社会高层次情报工作,处于有序的可控状态。通过对情报资源的系统发掘和加工,情报部门向用户输出各种情报以满足他们多方面情报需求。显然,这种社会工作以“情报生产”为目标,所提供的情报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对待。

情报部门的产品及其服务在商品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其地位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强。我们已经了解到,反映人类活动的原始情报一般不直接作为商品流通,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人们共同占有,这可以类比于自然物质资源。在社会信息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人们一般可以自行搜集情报,辅以有关情报部门提供的公共性情报服务,以获取情报来满足自己的情报需求。随着社会信息化,这一原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多方面的需求,致使人们转向对情报部门产品及其服务的系统需求。

用户需求的改变不仅是情报产品流通的社会基础之一,而且是情报产业部门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从经济学观点看,情报产业是以情报商品生产和有偿服务为前提的社会产业。情报产业作为社会一大产业部门,输入是“情报原料”,输出为“情报产品”,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产业具有极强的系统性。这说明研究情报产业结构及模式离不开对社会的系统性分析。

二、我国社会情报形态与产业基础

情报产业开发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社会情报工作发展的结果。情报产业的支持不仅以用户为基础,而且以社会物质、技术为基础。

社会情报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与社会情报形态相适应。所谓社会情报形态,是指社会基本形态在情报产生、传递、控制与利用方面的集中体现,它表征了受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性质等因素制约的情报利用状态与作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情报形态是人类情报资源分配与利用关系的总和。通过社会情报机理的分析和情报过程的考察,可以寻求社会情报形态的成因。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科技水平、产业分布以及自然资源等基本因素决定了情报形态的形成,而社会情报形态最终体现在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上:情报创造者与使用者(用户)的关系;社会职业分布与情报结构的关系;情报与载体的形态关系;情报的社会传递、加工、控制与利用之间的形态关系;社会情报意识与行为关系等。

研究社会情报形态的目的在于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情报工作的社会模式,从而高效率地组织情报工作。

一个国家的情报工作与社会情报形态的适应性是相对的,即一定的社会情报形态对应于一定的情报工作体制与工作模式。在社会发生变革之时,二者却存在某些不适应之处。由于情报形态由社会运行的内部机理决定,因而需要依据社会情报形态的变化来调整或改革社会情报工作。

关于情报工作的诞生,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起点。然而,情报工作作为国家

的一项事业、社会的一项独立工作，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截止5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的情报工作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的情报工作体制始建于1956年，至今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情报工作随着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其体制变化既体现了对社会情报形态的适应性，也体现了在社会情报形态作用下不断优化的机理。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情报形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情报资源的开发、管理、分配与利用上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这种关系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步的高速发展，反映在情报工作上，为社会情报效益的充分发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社会集中化、协调化情报体制的建立。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具备的优越性。同时，国家统一计划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从形态上决定了情报工作的“事业”性质和情报资源分配的计划性。这既是我们的优势，然而也是形态上的一个缺陷。其优势体现在情报资源的协同开发上；缺陷表现在由此而导致社会情报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用户情报需求的满足。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十年来，我国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体制和结构的不断优化，改变着社会的基本情报形态，致使情报资源的社会开发、分配与利用向经营型方向发展。

与社会情报形态相适应，处于改革中的中国情报工作开始从事业型向产业型方向迈步。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情报产品及其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是这一变化的集中反映。经济体制改革中情报形态的变化，不仅从理论上为情报商品流通和产业组织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从实践上建立了情报商品流通的经济机制。

就实质而论，情报产品属于知识性信息产品，情报产业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这一情况表明，分析情报产业的社会基础理应从社会的知识生产、组织与利用入手，全面考察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物质及技术基础。

国外所指的“Information Industry”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分别对应于“信息产业”和“情报产业”。其中，情报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仅限于情报生产、搜集、加工、存贮、流通、传递和服务等领域内的行业。除情报产业外，信息产业还包括信息处理产业、通讯产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产业等基础产业部门。情报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部门，这一情况决定了我们应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产业的基础。

改革十年，我国的社会情报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情报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在形成。鉴于情报工作的社会性质，其产业基础可以从社会总体结构着手进行研究。

(1) 经济基础。社会情报产业化程度及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及增长速度。从社会运行机制看，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可视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尺度，因此可以从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角度分析情报工作的经济基础。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用于情报工作的投资必然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一是情报投入与物质投入的比值甚小，二是社会的总投入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工作不可能形成产业化模式。改革十年，我国商品经济高速发展，致使各企业部门的情报投入大幅度增长，为了使投资合理化和高效化，有必要发展专门化的情报产业。从社会整体看，我国用于情报产业的投资潜力很大，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因此可以预计情报产业的经济基础将愈来愈好。

(2) 机构、人员基础。虽然我国发展社会情报工作的历史不长，到现在为止只有短短的33年，但是发展较快，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家情报工作体系。作为国家情报系统

的主体,一是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系统的科技情报机构。二是国家经委、计委及各专业部的情报工作机构。从纵向看,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又可以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以国家机构为主体,近十年来各种形式的情报协作网和专门性机构发展很快。这些机构在提高无偿情报服务的质的同时,正在开拓一些高质量的有偿服务项目。从人员结构上看,各级机构的人员素质和数量有了很大的变化。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约80%的部门具有发展情报产业的能力。

(3) 技术基础。计算机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已被公认为信息产业的支柱,而这又以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先导。以电子技术为依托的电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远程数据处理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我国的信息技术开始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包括专家系统在内的信息处理技术在情报工作的应用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从总体上看,情报部门的情报生产正在向自动化方向发展,作为现代情报工作基础的知识工程将成为创立新的工作模式的生长点。所有这一切,对于建立现代化产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4) 物质基础。美国情报学家 P·艾瑟顿将情报生产中的物质基础归结为物质情报源的核心部分。^④关于这一点,应从情报源的总体结构及开发水准两方面来认识。从总体结构上看,中国图书情报部门已从单纯的文献情报开发模式转为各种情报源的综合开发。从开发过程看,作为物质基础的情报设施改善很快,必要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及通讯设施在情报工作中已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物质基础的改善,为情报产业服务的多样化、高质化和高效化创造了基本条件。

(5) 用户基础。从社会情报形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用户的情报需求、心理及行为在“信息化”的冲击下正在发生变化。面对我国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技术市场的出现、社会流通的加速,传统的无偿情报服务方式已无法满足用户愈来愈高的情报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将转为高效化的情报产业的顾客。由此可见,现代情报产业的用户基础正在社会发展中形成。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情报事业的一部分正向产业化方向转化。这是社会的必然,是由社会基础所决定的。

三、我国情报产业的发展策略

我国的情报产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现代产业,始终以社会效益为重,并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由于社会的情报投入是一种次级投入,通过情报投入产出,保障社会的情报需求,以达到创造物质产品,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目的,所以我们说情报产业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只是手段。因此,我国情报产业化过程中决不会出现如法国学者 S·诺拉所指出的一些弊端。^⑤

情报产业作为社会产业,当然具有一般产业所具备的经济特征。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的情报产业模式只可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多种形式并存的,由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型产业。

根据产业形成的社会机理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我国情报产业部门可以按以下几类进行管理。

(1) 国家各级情报工作机构及相关部门的有偿服务。

中央和地方的情报所、信息中心、图书馆等部门以提供无偿情报服务为主,是国家情报

事业的主体部门。然而,在情报产业化过程中,这些部门日益增多的有偿情报服务又是我国情报产业经济的主要成分。国家情报机构及相关部门的产业化服务项目有各种目录、索引、文摘的出版发行、有偿咨询、情报研究与开发服务以及以机检为主体的文献信息检索服务等。

(2) 产业化咨询公司。

我国的社会咨询机构分为二类,一类是事业型的咨询部门,另一类则是产业化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开展各类有偿咨询服务,主要包括:管理咨询;科学咨询;技术咨询;项目咨询;市场咨询;产品咨询;贸易咨询等。这些公司大多是专业性的。就实质而论,咨询属于高层次的信息处理工作,是“知识”与“情报”相结合的产物。可见,作为产业的社会咨询是情报产业经济的又一重要成分。

(3) 技术市场经营部门。

技术市场是社会的技术经济和知识产业发展的结果。技术作为商品在市场中交换是技术市场的基本经营特征。鉴于物质商品与技术商品的本质区别,市场按特有的经营模式运行。无论是技术的有偿转让,还是以合同形式的协同开发,都是以市场经营者的技术经济情报服务为前提的,技术市场的经营收益则完全取决于服务的效果。近些年来,作为情报产业一部分的技术市场在我国已经崭露头角,今后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情报交换中心。

情报交换中心系指80年代在我国出现的各种类型的“信息中心”,其业务是向用户提供直接的情报(信息)服务。例如,1986年在武汉成立的民办“交通信息中心”,旨在为汽运部门和顾主提供汽车营运信息服务,以解决货车空驶和货求空车的矛盾。通过服务中心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求进一步发展。目前,该中心联合其它部门组成了全国性的“九州交通信息集团”。据不完全统计,这类中心已发展到千家以上,在我国情报产业中的比例日益上升。

(5) 广告信息服务业。

我国的广告信息服务业,十年来发展很快,这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现在,除了专门的广告公司从事广告业务外,国家电视、广播、新闻、出版等部门也广泛开展广告宣传及服务业务。这些业务都是收费的,因此也是情报服务产业的一个基本部分。

以上5类情报服务组成了我国的社会情报产业服务系统。此外,非情报(信息)生产部门也提供不同形式的有偿和无偿情报服务,其有偿部分作为产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无偿部分则是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我国的情报产业尚处于自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其产业形式、规模和结构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在产业的管理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因此,应从全局出发研究情报产业的发展策略和措施。针对这一情况,当前应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加强情报产业理论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产业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由于情报产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其理论研究尚不充分。有些方面(如我国现阶段情报产业化程度、结构、分布、产值和价格机制等基本问题),尚未展开系统性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内还没有类似于美国经济学家F·马克卢普(F·Machlup)和M·波拉特(M·U·Porat)等人的用于解释情报经济现象的完整理论,因此应着手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以求从实际问题出发解决相关的理论课题。

(2) 尽快制定情报产业政策。社会情报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然而

我国还未能颁布关于情报产业的具体政策。国家对情报产业的管理往往采取类似于一般产业经济的管理体制,情报商品经济中最现实的情报价格政策的制定几乎是空白。由于缺乏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法规约束,国内情报产业比较混乱,不少部门处于失控状态,其结果必然限制情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一问题,应由有关部门着手研究解决。

(3) 合理规划、科学管理情报产业。当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情报工作体系中的“事业”和“产业”成分必然长期并存,这是情报特殊的社会效益和传播方式决定的。当然,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产业”部分与“事业”部分之间存在着最佳的结构比例。这是产业规划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我国情报产业的上述5类产业部门的规模、产值、业务范围、产品项目以及服务对象等,也需进行具体规划,以求以国家情报产业经济为主体的协调发展。

(4) 增加情报投资。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是一项整体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和社会的发展。情报产业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情报利用率,促进社会情报工作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因此开展国家情报工作都要一定的投资,特别是在情报产业形成初期一般要增拨经费。在投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寻求最优的投资方案。

(5) 充分发掘情报资源,努力开发现代情报技术。情报资源是情报产业部门的原料库,现代情报技术的开发关系到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二者同等重要。近几年来,我国在发掘情报资源和开发情报技术方面,虽然进展较快,但与某些发达国家比尚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技术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改变这一状况的基本策略是发挥中国情报工作的总体优势,在国家统一规划下进行基础建设。

(6) 积极发展数据库产业。当前,世界数据库产业在情报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数据库已作为重要的情报商品而加速“流通”。今后企业可以从专业数据库中寻求组织专业生产的大部分情报,以适应日益加快的管理运行节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今后的数据库生产仍应以国家各级情报部门为主体,按中央、地方和专业部的情报业务范围进行专业分工,使之形成一个整体。

(7) 优化全社会的情报意识。情报产品的流通除取决于社会客观情报需求和情报产品购买力外,还取决于社会的情报意识。如果用户具有较强的情报价值观和意识行为,情报必然在流通中产生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优化社会情报意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拟可从情报服务方式的改革和情报用户培训着手,通过社会情报素质的提高达到优化意识的目的。

(8) 坚持改革开放,进入国际市场。改革开放是我国十年来坚持的正确政策,是国民经济起飞的重要保证。对于情报产业,正确贯彻和执行这一方针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不仅可以使我国的情报产品进入国际情报产品的流通领域和大循环之中,增强工农业产品的创汇能力,而且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外情报资源,改善国内的情报服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拓国际情报市场方面,应有相应的情报保密法规,以确保国家机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基础是好的,目前刚刚开始形成的情报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随着产业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社会情报工作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注释:

① N·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Machine*, 2nd ed, Cambridge, 1961, P11.

② 包玉珍等:《有偿服务在情报产业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科技研究所报告,1988,第19页。

③④ 胡昌平编著:《情报用户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301页。

⑤ 参见胡昌平著《情报控制论基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本文责任编辑 何天齐)